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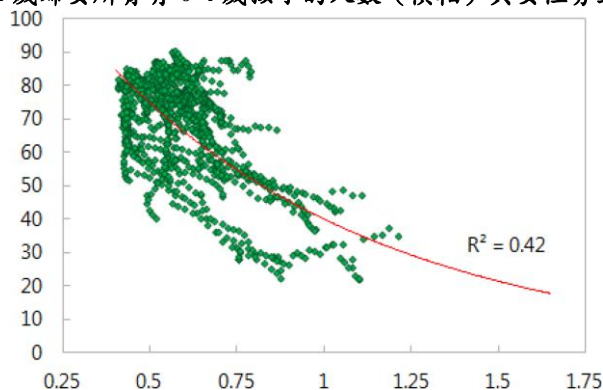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信報》專欄〈一名經人〉

### 鼓勵女性入職場 政策配套需加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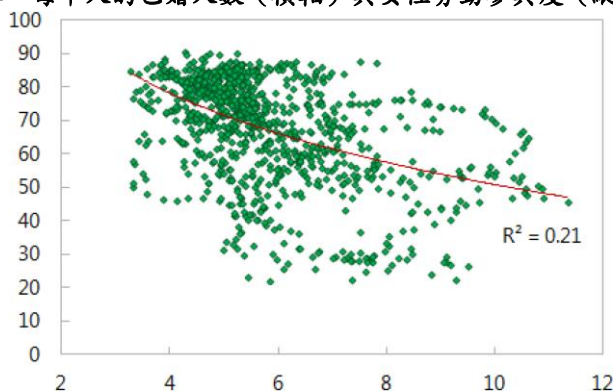
下星期五是假期，亦是戰後近七十年的勞動節。戰後幾年大量出生的那批生力軍，大概都退休了。不少國家即使未必出現長期經濟呆滯（研究指這未必關人口老化事），但大至政府小至家庭卻會面臨收支失衡問題——政府赤字、債務及人口撫養比例皆升。要短期內增加勞動人口，除以鄰為壑的輸入外勞外，唯一快建功的便是打女人主意。

國基會近月分別有兩批人做了這方面的研究，看看如何可以提昇女性勞動參與度，今文借用二文數據看看其發現（見參考）。首先直觀而言，當代生育率低，全球皆然，較諸上代動輒生三、五、七名的情況，現代女性應有較大可能進入勞動市場。事實上，從1960至2012年的經合國家數據所見，適齡工作的女性（15至64歲）育有學前幼童（0至4歲）的人數愈低（全國平均計，故出現非整數），其勞動參與度愈高【圖一】。參與度在生育幼童人數低於1時升得較快，大概當人數低於0.6，參與度便高於60。

圖一：每名15-64歲婦女所育有0-4歲孩子的人數（橫軸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縱軸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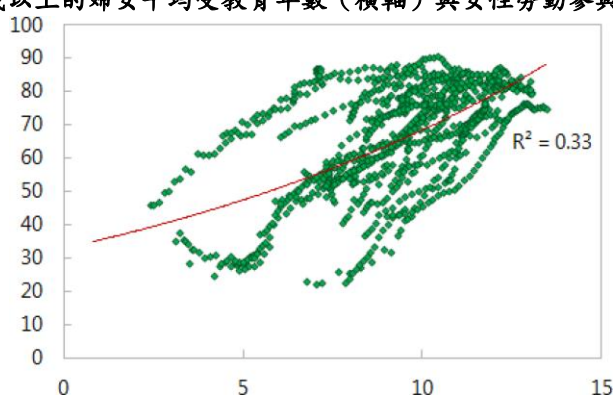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：每千人的已婚人數（橫軸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縱軸）



育兒數目涉及時間成本，直接影響女性勞動參與，那麼已婚女性比例有否影響呢？數據所見，驟看還是有的，但比育兒數目則關係差得遠了，數點明顯散亂（比較  $R^2$ ），呈一堆的，若無趨勢線亦難見關係【圖二】。畢竟，婚前婚後的時間成本應分別不大，縱有關係亦或因生育者多已婚有關。回歸分析顯示，兩個因素都可各自呈顯著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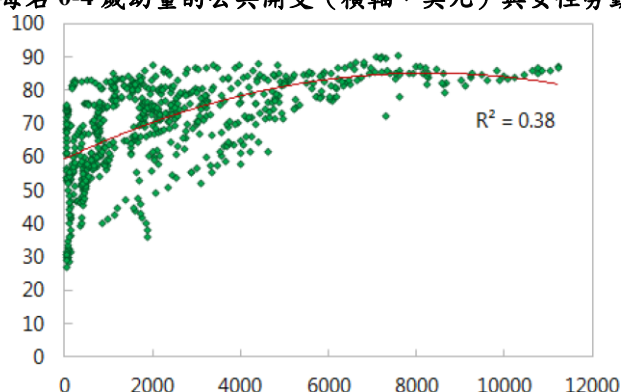
繼結婚生育後另一上代較少女性工作原因，是當時教育不只不普及，還重男輕女，起碼在好些地區便抱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之觀念。以25歲為界（快的話博士都讀畢），以上年歲的女性當中，受過十年以上教育者的勞動參與度明顯較五年以下高【圖三】。不計幼兒學習，這便是中學畢業與小學畢業之別；儘管再多幾年大學的分別未必大。

圖三：25歲以上的婦女平均受教育年數（橫軸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縱軸）



在既有的個人、家庭背景下，若解決日間托兒問題，便可讓母親們魚與熊掌得兼，維持工作。數據顯示，無論政府是否花錢於日間托兒，女性都可有相當高的勞動參與；不過，愈肯花錢之地，女性勞動參與度的下限愈高，關係呈「平頂上升三角」【圖四】。若每年能花七千美元於每名幼兒上的話，女性勞動參與度幾乎已確保在80、90水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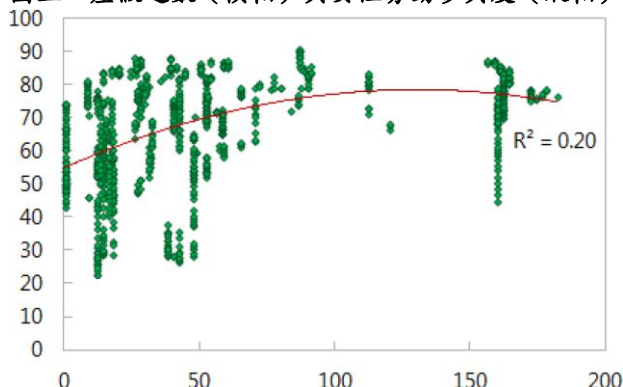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：日間照顧每名0-4歲幼童的公共開支（橫軸，美元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縱軸）



托兒政策配合有助女性工作，分娩政策之配合又有幾重要？本港有薪產假共十週，但原來在世界標準上不算多。有些發達國家（主要為歐洲）的有薪產假長達一至三年，固然未必十成支薪，亦有包括育嬰假（parental leave）。數據顯示，產假50週或下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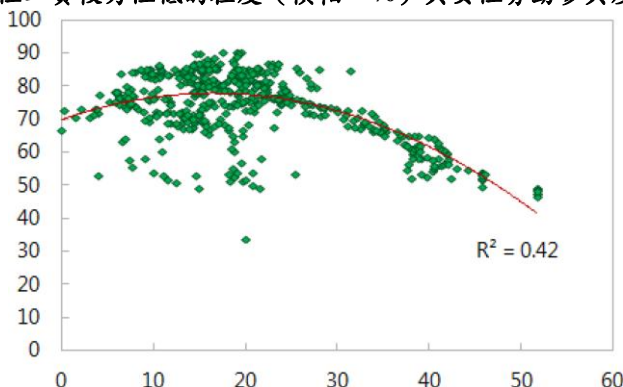
女性勞動參與度分別不大，但再加碼（即逾一年）則見明顯分別，參與度大增；固然，進一步再加至兩年或更長則未見進一步改善，甚至有反效果【圖五，留意曲線關係】。

圖五：產假週數（橫軸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縱軸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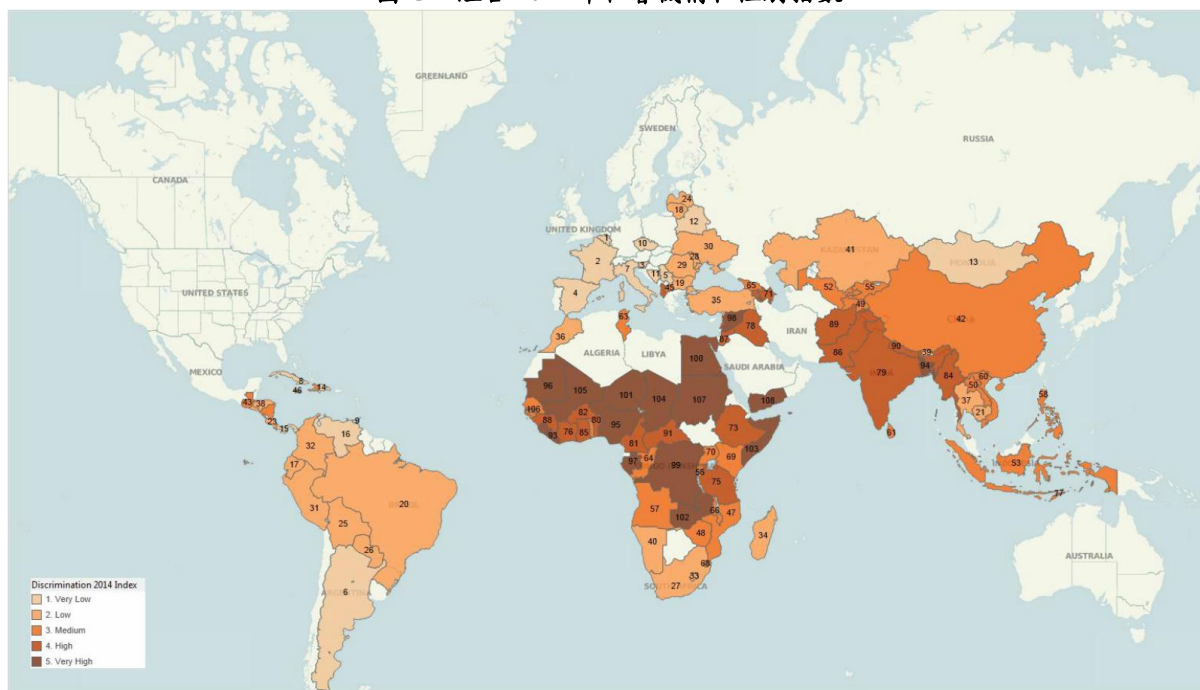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產假可提昇勞動參與度外，錢亦是重要誘因之一。各地經濟不同，何謂高薪，可參照男工薪酬作準則。觀圖所見，當女工薪酬由落後男工五成縮窄至三成的過程中，勞動參與度平均由不足一半升至超過七成【圖六】。然當薪酬差距進一步收窄至兩成、一成甚至零時，女性勞動參與度則仍在五至九成間分佈，變化不大。看來若薪酬有別，或許會決定男女角色，譬如誰在家中「湊仔」等，但差距還是要逾三成才見明顯分別。

圖六：女性工資較男性低的程度（橫軸，%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縱軸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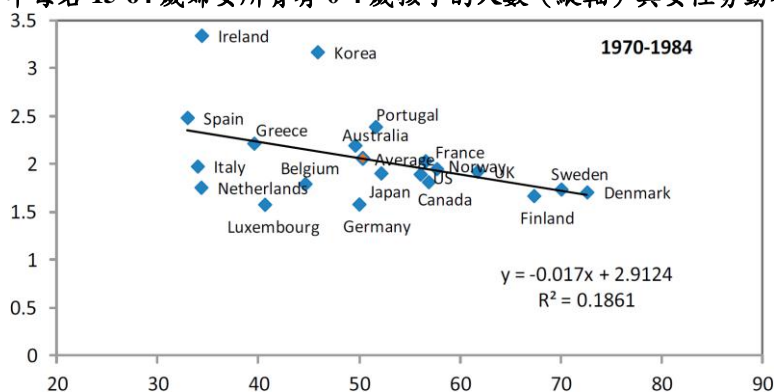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基會 Staff Discussion Note 的研究重點，則是繼上述傳統智慧已認定的因素外，再加上的男女平等法律因素。即使時至今天，其實不少地方仍有相當程度的性別歧視。從 2014 年的經合社會機構性別指數地圖驟眼所見，全球有約半領土的女性受到歧視，大抵由地圖的左下方延至右上方【圖七】。據其回歸分析所見，這因素是統計顯著的，包括與配偶的產權、繼承權、撫養權等關係，愈是平等，便愈有利於女性勞動參與度。這算是最低成本的政策，因教育、托兒、產假均涉成本，但平等法則僅再分配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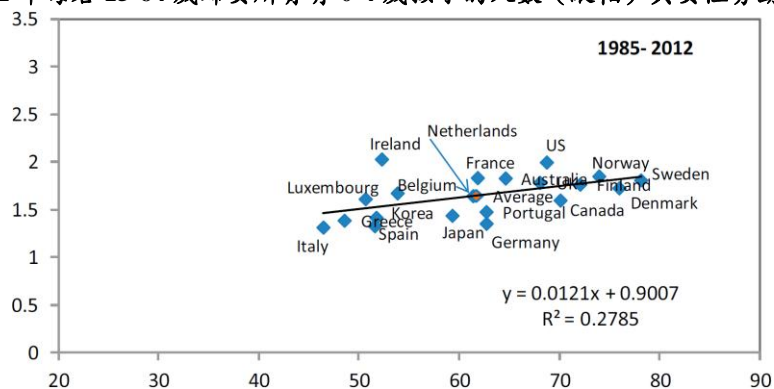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：經合 2014 年社會機構和性別指數



圖八：1970-84 年每名 15-64 歲婦女所育有 0-4 歲孩子的人數（縱軸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橫軸）



圖九：1985-2012 年每名 15-64 歲婦女所育有 0-4 歲孩子的人數（縱軸）與女性勞動參與度（橫軸）



從上述所引研究見到，回歸分析中幼童人數（圖一）是唯一未必統計顯著的因素。到底育兒是否女性工作的負累？另一份國基會研究，同樣剖析育兒與勞動參與率關係，



但卻分開 1980 年代中前後進行。分析經合國家顯示，早年育兒愈多的確愈不利參與率【圖八】，但近廿年情況卻見逆轉【圖九】；這是以各國在這兩段時期內平均計算而得。在本港托兒等政策配套不足之地，大家或許認定不利；但別忘記外國在這方面卻不然，不少政策是相當站在僱員一方的。是故只要配套做得好，是否母親未必影響參與度。

在一個社會裏，女性結婚及生育多寡有很多經濟及非經濟的因素影響，不易改變。不少國家試過不少鼓勵生育的政策（如星洲），但效果卻不明顯；相反一場大戰過後，各地政府毋須什麼特別政策，生育率亦自然飆升（包括戰後，甚至九一一後的紐約）。政策不易改變生育率，但卻可提昇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程度，從上文數據清晰可見。

在本港，儘管大學裏頭已女多男少，但去年男、女勞動參與率分別為 69% 及 55%，顯然仍有收窄空間。男、女薪酬縱有差異，但在自由市場下政府可作為的不多。反而，分娩、育兒等的政策配套（尤其後者），譬如拓展半職市場等，便有相當改善空間。

參考：

1. Christian Gonzales, Sonali Jain-Chandra, Kalpana Kochhar, and Monique Newiak (2015), "Fair Play: More Equal Laws Boos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,"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. 15/2, Feb.
2. Yuko Kinoshita and Fang Guo (2015), "What Can Boos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sia?" IMF Working Paper No. 15/56, Mar.

羅家聰  
環球金融市場部